

doi:10.16018/j.cnki.cn32-1499/c.201701002

论崔义田对新四军医疗卫生事业的贡献

张金林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崔义田长期在新四军医疗卫生系统担任重要职务,是新四军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开创者和主要领导人。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同时,崔义田经常深入到医疗卫生工作的最前线,组织与领导医疗卫生人员开展工作,并身体力行,亲自为伤病员治疗战伤和各种疾病。崔义田为新四军医疗卫生事业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新四军;崔义田;抗日战争;医疗卫生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17)01-0007-08

崔义田(1906—1989),号礼门,辽宁锦西(现葫芦岛市连山区)人^{[1]94}。崔义田是新四军医疗卫生事业的主要领导人与重要创建者,为新四军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新四军军部成立后,沈其震任军医处处长^{[2]14}。1938年3月,崔义田参加新四军^{[3]362},成为第一批参加新四军的医疗卫生人员之一^{[4]50}。8月,新四军后方医院在太平县小河口成立,崔义田任院长^{[5]215}。

1939年9月,第一支队军医处处长王聿先调任新四军军医处副处长^{[6]245},崔义田出任第一支队军医处处长^{[7]3},并兼任支队前方医院院长^{[2]146-147}。11月7日,第一、二支队的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驻地在溧阳县水西村,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8]54}。崔义田任江南指挥部军医处处长,并兼任指挥部前方医院和后方医院院长^{[2]27}。

1940年6月,陈毅、粟裕率江南指挥部主力和指挥部机关渡江北上^{[9]212}。7月下旬,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10]38}。崔义田任苏北指挥部军医处处长^{[1]94},并兼任指挥部前方医院院长^{[2]148}。苏北指挥部于10月3至6日发动了黄桥战役^{[11]102}。而后,在东台县新灶组建指挥部后方医院,崔义田任院长^{[5]34,38}。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

指挥部在海安县成立^{[2]42}。叶挺、陈毅分任正、副总指挥,叶挺未过江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总指挥部军医处处长由崔义田担任。苏北指挥部前方医院由新灶迁至盐城海神庙,改称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后方医院^{[2]36,148}。

1941年1月,蒋介石集团制造皖南事变,取消新四军番号。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12]3}。在盐城成立了新四军卫生部,沈其震任部长,崔义田任副部长^{[4]53}。7月22日,新四军华中卫生学校在盐城高作镇开学,崔义田任校长^{[13]44-45}。1943年初,沈其震赴延安,崔义田出任新四军卫生部部长^{[4]57}。

一、建立与完善医疗卫生机构

崔义田十分重视新四军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任新四军后方医院院长时,崔义田带领医疗卫生人员,利用祠堂和民房开设门诊部和病房。门诊部设手术室、药房、化验室、X光室。在部队协助下,盖了2幢“竹子病房”,有病床200张,收治内科、外科和结核科伤病员^{[14]3,15}。医院还设有营养室、淋浴室和灭虱室。在崔义田的主持下,医院进行了规章制度建设,先后建立了病历和医疗护理常规制度、查房制度、病房管理制度等^{[4]51}。后方医院的建设深得各界人士的好评。美国记者

收稿日期:2016-12-20

作者简介:张金林(1981—),男,河南息县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和新四军史。

史沫特莱参观该院时说,这是她在中国看到的最好的军队医院^{[15]641}。

崔义田在第一支队任职时,对支队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了调整与完善。在崔义田到第一支队前,支队军医处只有几名办事员^{[2]15}。支队所辖的第一、二团设有卫生队,队长分别是明道德和徐金元^{[2]20}。在安徽郎溪县梅渚王家祠堂设前方医院,另在水西村西南的神塘圩设病房,收治少量病人^{[2]146-147}。崔义田到第一支队时,带了一批医疗卫生人员和医药设备。先后随崔义田到第一支队的医疗卫生人员有薛和、赵国宝、唐求、汤禧承、浦敬铨、张鑫元、顾纪书、何林、吴友廉、陈琦影、周丽霞、尹林堤、吴淑君、牟桂芳、徐木生、张启隆等^{[2]25}。崔义田对前方医院的领导层进行了调整,范钦洪任政治教导员,赵国宝任医务主任。同时,建立与健全了医院的医疗护理制度,扩大了医院收容伤病员的能力,可收容伤病员 200 余名^{[2]147}。

任江南指挥部军医处处长后,崔义田建立与健全了指挥部的医疗卫生机构。军医处医务主任是林震,设医政、保健、材料 3 科,分别由薛和、唐求、张启隆任科长^{[2]27,37}。指挥部下辖挺进纵队、第二、四团和新三、六团及地方武装^{[8]54-55}。指挥部所辖各团、纵队设有卫生队或军医处。其中,挺进纵队设军医处,李子民任处长,陈耀汉、胡墨林、刘振之分任医政、保健、材料科科长。纵队第一、二、三、四团卫生队队长分别是黄德明、汤禧承、彭克、王子良。1940 年 3 月,第四团主力与挺进纵队第三团合编为苏皖支队。支队设卫生队,队长是高黎民、彭克,另设休养所和卫生人员训练班^{[2]28}。同时,有关医院进行了重组,并设立了新医院和疗养所。1939 年 11 月,原第一支队前方医院移至溧阳县社渚,与原第二支队设在安徽宣城章村的医院合并成立江南指挥部后方医院。原第一支队在神塘圩的病房扩建为江南指挥部前方医院,设手术室、化验室、药房等。1940 年 3 月,前、后方医院合并。6 月,医院迁到水西村。1939 年 9 月,江抗主力西撤扬中后,江抗医院在院长林震的带领下,坚持在阳澄湖畔,继续治疗伤病员。1940 年 6 月,林震率领医院部分医务人员,在澄锡虞地区成立疗养所,张贤任所长。1939 年 11 月,挺进纵队先后在扬中和江都吴家桥设医院^{[2]147-148}。

苏北指挥部军医处成立后,崔义田对指挥部

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了建设。军医处设医政、保健、材料、总务 4 科。薛和、张启隆、曾若定分任医政、材料、总务科科长^{[2]37-38}。指挥部将所辖的挺进纵队、苏皖支队、第二团、新六团整编为 3 个纵队 9 个团^{[16]65}。纵队设军医处,团设卫生队。具体情况是:第一纵队军医处处长是李子民,医政、保健、材料科科长分别是陈耀汉、胡墨林、刘振之,所辖第一、四、五团卫生队队长分别是谭恩济、王子良、杨慕陶;第二纵队军医处处长是唐求,医政科、材料科科长分别是汤禧承、唐国栋,所辖第二、六、九团卫生队队长分别是徐金元、张鑫元、顾纪书;第三纵队军医处处长是高黎民,医政、保健、材料科科长分别是蒋天龙、曹苏民、余海南,所辖第三、七、八团卫生队队长分别是廖仕宏、孙惠民、彭克。此外,指挥部军医处还辖有联合抗日司令部卫生部、苏北行委会警卫团卫生队、崇明自卫总队卫生队等机构^{[2]38}。

崔义田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军医处处长后,对所辖部队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了调整。总指挥部所辖部队主要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江北指挥部、豫鄂挺进纵队和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五分校以及八路军第四、五纵队^{[16]96}。苏北指挥部、江北指挥部、豫鄂挺进纵队的医疗卫生机构变化不大,仍分别由崔义田、宫乃泉、栗秀真任军医处(或医政处)处长^{[2]37}。八路军第四、五纵队是由新四军和八路军部队混编重新组建而成的,医疗卫生机构也进行了重组。第四纵队由八路军第三四四旅(不包括第六八七团)和新四军第六支队(不包括第四总队)编成,辖第四、五、六旅。纵队卫生部部长是林士笑,政委是赖毅,医务主任是叶果。纵队卫生部设医务、卫生、材料、总务 4 科。第四旅军医处处长是李永春,医务主任是尚程云,所辖第十一、十二团卫生队队长分别是刘文斌、章少卿。第五旅所辖第十三、十四团卫生队队长分别是赵宏谋、韩青山。第六旅军医处处长是何岳,所辖第十六、十七、十八团卫生队队长分别是刘晏明、余福祥、周侠宙。纵队卫生部设后方医院和 3 个休养所。后方医院院长是叶果,3 个休养所所长分别是王广胜、张介民、李庆华。第五纵队由八路军新二旅、第三四四旅第六八七团、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和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编成,辖第一、二、三支队。纵队卫生部部长是张化一,医务主任是王成旭。纵队卫生部设医务、卫生、材料 3 科。第一支队军医处处长是申

涵,所辖第一、二、三团卫生队队长分别是牛步云、廖忠诚、廖永祥。第二支队军医处处长是刘胜望,所辖第四、五、六团卫生队队长分别是李聪、彭少银、高良。第三支队军医处处长是朱亮初,所辖第七、八、九团卫生队队长分别是张益民、周志贤、蒋定安。纵队军医处设休养所,所长是詹彪。此外,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五分校设有卫生队^{[2]35-37,41-42}。

在任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部长期间,崔义田参与和领导了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组建工作。根据1941年新四军卫生部颁布的《新四军卫生工作条例(草案)》(下称《条例(草案)》)规定,新四军卫生部的组织结构如下:设部长1人、政委1人、副部长2人、医务主任1人;设医政、保健、材料、管理(即总务)4科。科下设股,医政科设医政股、训练股,保健科设保健股、卫生教育股,材料科设采办股、管理股,管理科设管理股、会计股、文书股。各科设科长1~2人、股长2~3人及科员数人。管理科附设杂务人员若干;直辖单位包括各师卫生部、华中卫生学校、后方医院、抗日军政大学卫生处、军直属各门诊单位^{[17]20}。关于师卫生部的组织结构,《条例(草案)》规定:设部长、政委、副部长、医务主任各1人;设医政科、保健科、材料科、管理科;直属单位有华中卫生学校分校、后方医院及直属部队卫生队、门诊所。华中卫生学校分校设校长、主任、队长、政治指导员各1人。后方医院设院长、医务主任、政治指导员各1人。后方医院设门诊室、药剂室、化验室、手术室、管理科和所部,各设主任或科长及工作人员若干。管理科设警务排及杂务人员若干^{[17]22}。关于旅卫生部的组织结构,《条例(草案)》规定:设部长和政治指导员各1人;设医政科、保健科、材料科、管理科;直辖单位有卫生训练班、野战医院、旅直属各部队卫生单位。野战医院设院长、医务主任和政治指导员各1人。院设单位包括门诊室、病室、药剂室、手术室和管理科,设室长或主任1人及工作人员若干^{[17]25}。关于团卫生队的组织结构,《条例(草案)》规定:设正、副队长及政治指导员各1人;设医政股、保健股、材料股和管理股;直辖单位包括门诊所、收容所、团直属部队卫生单位。收容所设所长、病室室长、管理员各1人及工作人员若干^{[17]28}。关于营、连卫生机构的组织结构,《条例(草案)》规定:营设卫生所或医务所,设所长1人、卫生班长1人、调剂员1人、卫生员3人;连设

卫生员或保健员1人^{[17]28}。此外,《条例(草案)》对军、师、旅、团、营、连各级卫生机构的职责、工作制度等做了详细的规定。

二、培养医疗卫生人员

新四军军部成立后,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原有的医疗卫生人员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医疗卫生知识上,都不能满足需要。为此,军部在皖南时期,军医处办了6期医务干部训练班和1期化验技术训练班,培养医疗卫生人员200余名^{[2]206}。崔义田在医务干部训练班第1~4期兼任教员,主讲外科学。崔义田讲课“深入浅出,内容简练,有理论有实际,易懂、易学、易记”^{[14]105}。他要求学员注意医德,强调学医要牢记3句话,即“要有老鹰一样的眼睛”“要有女人的手”“要有慈母的心肠”^{[14]267}。崔义田深受学员的爱戴。据医务干部训练班学员郭光华回忆:“对我们不懂的问题,有问必答,态度和蔼、谆谆引导,大家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所以同学们对他非常钦佩和尊敬。”^{[14]161}此外,在崔义田的主持下,后方医院承担了医务干部训练班前3期的结业实习任务^{[14]81}。

在军部军医处成立训练班培养医疗卫生人员的同时,各指挥部和支队军医处也相继开办了训练班,培养医疗卫生人才。崔义田任第一支队军医处处长后,陈毅要求其“用办学校、训练班和带徒弟的办法,迅速为部队培养医药卫生干部,以适应部队发展的需要”^{[7]3}。江南指挥部成立后,1940年1月,崔义田在神塘圩主持开办了江南指挥部军医处医务人员训练班,有学员40余人^{[13]40,376}。学员多为部队里具有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和医疗卫生人员^{[2]207}。训练班所用教材是崔义田从新四军军部带来的,与军部军医处医务干部训练班所用教材相同^{[13]40}。崔义田在训练班亲自讲授解剖学、外科学等。当时的教学环境很差,“老百姓的一块门板,借来就当黑板,竖靠在一棵大树旁,场院坟头,就是课堂教室。”“为了教好解剖学,在有一天的半夜里,崔处长带领全体学员到野外提了一盏马灯,找到荒山上一堆野坟,挖出了骨骼带到宿舍,用水洗净,就做了一副人体骨骼标本为学习用”^{[14]119}。在担任苏北指挥部军医处处长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军医处处长时,崔义田延续了江南指挥部时期的做法,办了第2、3期训练班^{[14]100}。第2期称苏北指挥部军医处医务人员训练班,于1940年7至11月

在黄桥开办,有学员 20 人。第 3 期称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军医处医务干部训练班,于 1940 年 11 月至 1941 年 5 月在盐城竹墩开办,有学员 50 人^{[2]206-209}。

任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期间,崔义田积极培养医疗卫生人员。1941 年 2 至 5 月,他在盐城伍佑主持开办了 2 期新四军卫生部医务干部训练班,有学员 50 余人,均是现职医疗卫生干部^{[2]206-207}。其中,第 2 期学员都是由抗大介绍来的^{[13]42}。前文已述,7 月,崔义田主持创办了华中卫生学校。该校有学生 200 余人,多数是来自华中地区的知识青年,少数是从部队里选送来的知识青年^{[13]44}。崔义田亲自在训练班和卫生学校授课。如在训练班中,崔义田讲授实用外科学^{[14]108}。1942 年 10 月,在崔义田等人的支持下,于安徽来安县大柳郢第二师卫生部驻地成立了华中医学院,沈其震和宫乃泉分任正、副院长,学员是来自新四军军部和从各师选送来的技术骨干和医疗卫生干部^{[18]155-157}。崔义田亦在该校兼课,讲授外科应用解剖^{[13]382}。此外,崔义田十分关注各师医疗卫生人员的培养工作。如 1941 年 11 月底,新四军卫生部与第三师卫生部合办了医务干部训练队,主要对第三师师直属医疗卫生干部,并对军部及其他师医疗卫生干部进行培训。第三师卫生部医务主任杨光任训练队主任。军部直属休养所是训练队的实习基地。开学时,崔义田亲自到会,并发表讲话。同时,崔义田亲自负责外科方面的教学与实习。他负责给学员讲授创伤和疾病外科。其中,创伤方面主要讲四肢战伤、单纯闭合骨折和创伤骨折、截肢手术、腹部探索及胸、颈、头部创伤急救处理等。在疾病外科方面,他主要讲授发炎、溃烂、肿瘤、急腹症、腹股沟疝、睾丸疾病、肛门痔瘻等的诊断与治疗,以及早期人工引产等的手术疗法。讲课时,崔义田十分强调医疗作风问题:要有献身革命事业的精神;要时刻理解伤病员的心情与痛苦;要及时请教,组织会诊,制订出合理的医疗方案;要团结合作;要善于组织力量^{[14]144-146}。

任新四军卫生部长,全面主持新四军医疗卫生工作后,培养医疗卫生人员是崔义田工作的重点。1943 年初,第二师卫生部从部队调来 7、8 名医疗卫生骨干,组织了“二师高级研究班”,至 10 月结束。崔义田对研究班十分重视,每周从几十里外的新四军卫生部驻地,来研究班讲骨科学 2

至 3 次^{[14]66}。在崔义田的决策下,新四军卫生部于 1944 年 4 至 12 月,在盱眙县姚庄设立了医务干部轮训队,由宫乃泉主持工作^{[2]206-207}。轮训队下设医训班、药训班、化训班,分别有学员 27 人、33 人、26 人。医训班学员均是团卫生队长以上的医疗卫生干部,药训班和化训班学员也是部队的在职医疗卫生干部^{[14]165}。崔义田亲自授课,并带领学员实习与见习^{[14]91}。除了在有关医疗卫生训练班授课外,崔义田积极筹建新四军军医学校。克服无高级教学人才、无教学设备和校舍、无教学经费、无办学基础和教学经验等困难,崔义田等人于 1944 年底完成了学校的筹建工作。该校于 1945 年 5 月 12 日在常庄开学,学制 2 年。第 1 期招收高中毕业生和少数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共 120 人^{[14]200,207[2]194}。

新四军军部重建后,在崔义田等人的领导与重视下,军、师(军区)、旅(军分区)、团均建立了规模不等的医疗卫生教育机构,逐步形成了高、中、初层次分明且较为完整的医疗卫生教育体系。军卫生部直辖的医疗卫生教育机构负责培养有较高水平的医务员和化验员等技术干部,轮训提高卫生队长、所长以上的现职干部,共培训了 462 人^{[2]193}。师(军区)卫生部直辖的医疗卫生教育机构负责培养一般的医务员、见习医务员、司药、化验员等技术干部,轮训见习医务员以上的现职干部。据对第一、二、三、四、五、七师直辖的医疗卫生教育机构的统计,共培训医疗卫生人员 2994 人^{[2]195}。以第五师为例,师卫生部共举办了 3 期医训队,并创办了鄂豫边区卫生学校。3 期医训队分别有学员 32 人、100 人、80 人,鄂豫边区卫生学校有学员 80 人^{[19]70[2]214-215}。旅(军分区)卫生部直辖的医疗卫生教育机构负责培训初级医务技术人员。据不完全统计,1941 年至 1945 年 9 月,共培训医疗卫生人员 2270 人^{[2]197}。如第十八旅举办了 5 期卫训班(队)培养连队卫生员 190 余人,1 期卫生集训队培养旅、团卫生干部(队)工作人员 40 余人,1 期医训队培训团、营、疗养所在职医疗卫生干部 19 人,1 期药训班培养药材工作人员 20 余人。第十八旅还办有卫生学校,有学员 50 余人^{[20]177-180,192-193}。此外,多数团卫生队经常开办 10 至 20 人的卫训班^{[2]197}。如第七师第五十八团卫生队于 1942 年冬开办了卫训班,有学员 15 人^{[14]231}。

三、组织与领导伤病员的救治工作

经过三年游击战争,南方红军部队出现了许多伤病员。新四军军部移驻岩寺后,很多伤病员随部队来到皖南。军部军医处利用祠堂开设了门诊和休养所,对伤病员进行了集中治疗^{[2]15-16}。1938年7月,崔义田带领曹明、郑素文、吴启等人到达云岭军部驻地。到云岭的第2天,崔义田等人在镇上开设了简易诊所,为部队伤病员和驻地群众治病^{[14]65-66}。后方医院收治了大量从前方部队转来的伤病员。住院病人中,以肺结核病人最多,占1/4^{[17]12}。经过治疗与护理,多数伤病员很快治愈出院,返回部队。由于集合了新四军当时几乎全部的高级医生与高级护士,加之免费为周围群众治疗与手术,尤其是1例卵巢囊肿摘除成功后,后方医院医术高超的名声传开,吸引了百里外的群众前来就医^{[17]190}。崔义田亲自为伤病员诊治。据时为军部战地服务团团员的马莲珍回忆,其腹部疼痛就是由崔义田亲自检查诊治的^{[14]129-130}。崔义田对伤病员态度和蔼,关怀备致。有个病人“性情暴躁,还不讲理”,因对治疗不满意,向医护人员发脾气,并打了崔义田一巴掌,引起医护人员的不满。崔义田并未生气,用轻松幽默的方式予以处理^{[14]51}。在崔义田等人的领导下,1938年和1939年军部前、后方医院分别收治伤病员1651人和3042人。2年分别有1074人和2207人治愈出院,436人和319人的伤病情有进步并出院^{[2]162}。

任第一支队前方医院和江南指挥部前、后方医院院长时,崔义田带领医院工作人员,救治了大批伤病员。崔义田时常来往于军医处和医院之间。在医院时,他亲自查房和进行手术,使伤病员得到了及时治疗。据徐文华回忆,在同日军的战斗中,其所在部队有6人受伤,被送到第一支队前方医院。崔义田亲自为他动了2次手术,手术很成功,2个月后回到部队^{[14]123}。在战争环境下,伤病员经常被分散到老百姓家里,且经常进行转移。如江南指挥部主力渡江北上后,崔义田把医院的病人分散到了群众家里。他亲自带领医务人员,化装成普通百姓,走村串户,就地取材,对伤病员进行巡回医疗^{[14]284}。

崔义田第一次组织领导大规模运动战的战伤救治工作是在黄桥战役。战前动员会上,陈毅指出:“有崔义田大夫在这里为我们治伤治病,同志

们勇敢地打吧!”会后,陈毅嘱咐崔义田:“这次战斗规模大,时间紧迫,没有后方安全地区,伤员可能很多,你们要做好战伤救治的组织和医疗技术力量、药品器材的准备。”^{[14]5}此役的伤员救护工作是由苏北指挥部军医处直接负责的。军医处在黄桥西南的黄家溪、棺材场等地设有野战医院,收治伤员近千人^{[2]34}。伤员送到医院后,在崔义田的组织下,对战伤进行了分类收治。重伤员立即被送到手术台,分2台进行手术,术后送到重伤病房。轻伤员被送到轻伤病房进行重新包扎^{[4]58}。战役结束后,对伤员进行了分流。第一纵队的近300名伤员由纵队军医处收治。其余伤员做了如下处理:组织轻伤队收治轻伤员;组织休养所收治中等程度的伤员;200余名重伤员经手术处理后,由指挥部军医处收治。而后,又陆续将伤员送到新灶,改由后方医院进行治疗^{[2]34}。

1940年12月,在曹甸战役中,崔义田带领手术队靠近前线,亲临第二纵队军医处。崔义田等人对重伤员进行了手术抢救,待伤势好转后,送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后方医院进行治疗。一般伤员经过扩创手术治疗,就地休养,待伤势减轻,身体基本恢复后,立即回归所在部队。轻伤员经过包扎后,立即归队。崔义田将“医疗机构前伸,就地抢救治疗,减少伤员长途转运,及时得到救治,提高了治愈率”,从而“开始建立了战伤救治体系”,使新四军战伤救治工作前进了一大步^{[4]59}。

新四军军部重建后,《新四军卫生工作条例(草案)》详细规定了战时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救治范围与要求。《条例(草案)》指出:“各级卫生机关应于战斗开始前,根据部队战斗部署布置救护所。”具体规定如下:营、连医疗卫生人员在第一线抢救伤员,要求技术熟练,动作迅速,检伤仔细,不得遗漏伤员。伤员由担架队转送包扎所;团卫生队派医疗卫生人员随团首长,并在离前线较近处设包扎所;旅卫生部派医疗卫生人员随旅首长,并酌量增设临时收容所,将伤员转送野战医院或后方医院;师卫生部在适当地区设立野战医院,开展救护和手术工作,并指挥救护事宜^{[17]41-42}。在崔义田等人的领导下,各师认真落实了上述规定,健全了相关机构,加强了技术力量,提高了伤员救治技术水平。以第五师为例,在连设抢救组,由副指导员或支部书记及理发员、卫生员组成,搬运伤员的担架由营或团的担架组负责;在营设救

护所,由副教导员、支部书记、副官、医助或医生、卫生班长、卫生员等组成,转运用的担架由团派的担架班负责;团设救护所,在团后方指挥所的领导下,由医护技术、药材供应、洗涤消毒、行政、政工、供给等人员组成,以卫生队为基础开展工作;旅设医疗接转站或野战医院前方所,由卫生队正、副队长、政治指导员、文化教员、副官或管理员、文书、医生、医助、看护长、司药、调剂员、卫生班长、卫生员、司务长、上士或采买、炊事班长、炊事员、通讯员、运输员或挑夫、理发员、勤务员、饲养员等组成^{[19]20}。

在组织与领导各师落实《新四军卫生工作条例(草案)》中关于战时救护工作规定的同时,崔义田在后方亲自为伤病员治疗战伤和疾病。如1942年5月,陈锐霆在阜宁县汪朱集华中局党校学习时,“因打篮球用力过猛引起旧刺刀伤形成的腹疝扩大,呼吸气短”,被送到新四军卫生部医院治疗,主治医师即为崔义田。经过崔义田“开刀缝补腹疝”,陈锐霆很快病愈出院^{[14]23}。张凯患消化道疾病,长期得不到治疗。1944年冬某日,他突然肠大出血,生命垂危。崔义田在“一无设备,二无药品”的条件下,以精湛的医术,对他进行了手术,使其“转危为安,脱离了危险”^{[14]21}。据左英回忆,找崔义田看病的人从早到晚“川流不息”,使其“酷暑也未能午休”^{[14]27}。此外,崔义田经常深入前线,组织和参与战伤救治工作。如1945年4月,在淮南津浦路西对国民党顽军的黄幢庙战役中,崔义田亲自带领部分专家和医务干部轮训队部分学员组成手术队,越过津浦路敌人封锁线,到达路西第二师前线指挥部后方医院。这次战役共有伤员1800余人,仅重伤员就有300余人,绝大多数伤员需要做手术。崔义田带领手术队对伤员“一边输液,一边做人工呼吸,一边做手术”,使许多重伤员得到了及时抢救治疗,减少了死亡,“圆满地完成了战役卫勤保障和抢救治疗任务”^{[14]54-55,61-63}。

四、狠抓部队的保健工作

新四军军医处成立后,提出了“防疫重于治疗”的观点^{[2]108}。军医处设立了保健科。1938年秋,撤消保健科,护士部代管保健工作。1939年11月,恢复保健科^{[17]4-5}。军部在皖南时期,在保健科、护士部的主持下,主要开展了卫生宣传教育、卫生整顿、预防接种、体格检查、卫生制度建设

等工作^{[2]108}。

在这一时期,关于部队的卫生保健,崔义田主持或参与了下述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体格检查。如经检查,江南指挥部所辖部队3.14%患夜盲症^{[17]6};第二,预防接种。江南指挥部驻地水西村一带,天花、霍乱、伤寒等“时有流行”,崔义田带领医疗卫生人员为部队和机关及时进行了种牛痘和打预防针。由于预防接种及时,“没有发生过一例上述的传染病”^{[7]43}。据统计,1940春,江南指挥部所辖部队共有2094人接种牛痘,占总人数的79%。夏季,分2次进行了伤寒霍乱疫苗注射,注射人数分别是1862人和1114人^{[17]6-7};第三,治疗传染病和多发病。如黄桥战役结束后,部队出现了大量霍乱病人。崔义田组织医疗卫生人员积极进行救治,“亲自为病人检查、治疗、挂盐水”,并因此得了霍乱。经过崔义田等人的努力,未出现人员死亡情况^{[14]131};第四,卫生宣传教育。任江南指挥部军医处处长时,崔义田带领医疗卫生人员“广泛进行宣传教育,普及卫生常识,发动军民改善卫生环境”^{[14]4}。

新四军军部重建后,部队不断发展壮大,保健工作更加繁重。在崔义田的领导与推动下,新四军的保健工作进一步加强,进入全新的历史时期。具体来说,这一时期新四军的保健工作主要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健全各项制度。《新四军卫生工作条例(草案)》第二篇第三章《部队卫生工作条例》对新四军军医处于1940年11月颁布的《保健员的三大任务》中关于保健工作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补充、完善与细化。《部队卫生工作条例》对个人卫生管理、营舍卫生管理、给养卫生管理、疾病管理、行军卫生管理、战时卫生管理、卫生纪律、军政首长的卫生责任等均做了十分详细的规定^{[17]42-47}。1943年4月,新四军司令部发布了题为《夏令卫生应有设施规定》的通令,对夏季的厨房卫生、饮水问题及厕所、污沟防蝇等问题作出了具体的规定^{[17]69}。

第二,开展卫生宣传教育。1941年11月9日,新四军卫生部发布了《目前部队医务卫生材料工作指示》,要求各级卫生机关“要特别强调卫生教育,预防疾病的发生和流行”^{[17]53}。开展卫生宣传教育的形式主要有:(1)上卫生课。各部队普遍建立了每周上卫生课制度。如第十八旅将上卫生课列入军事训练计划中。旅卫生部长及团、

营卫生干部以营、连为单位,给干部和战士上卫生课,老医疗卫生人员也单独在连队讲课^{[20]7}; (2) 出黑板报和墙报,贴卫生标语和卫生宣传画^{[2]110}; (3) 开演讲会,演卫生剧。1943年5月,第四师第九、十一旅在护士节开展清洁运动周期期间,召开大会,演卫生剧^{[17]71}; (4) 编印卫生小册子。新四军卫生部编印了《大众卫生手册》《大众卫生》《战士卫生》等小册子^{[17]58-59}。各师卫生部也编印了多种通俗易懂的小册子,如第四师卫生部印发了《行军宿营卫生教材》等小册子^{[17]64}; (5) 利用报刊宣传。《健康报》《先锋医务》《播种者》《卫生画报》《大众卫生旬刊》《医务生活》等医疗卫生类刊物刊载了大量关于预防与控制疾病常识的文章^{[18]49, 105[17]58[21]26}。1942年5月,左英和崔义田商量后,向陈毅提出将《健康报》由油印改成铅印,并增加篇幅,用图画、文字、诗歌、曲调等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干部和战士普及卫生常识,发动其讲究卫生,预防与控制疾病^{[17]69-70}。此外,《苏中日报》《抗敌报》《拂晓报》《大江报》《江淮日报》^{[2]110}《挺进报》《战士生活》^{[19]14}等也介绍了许多卫生防病知识; (6) 举办卫生展览会。1944年,第四师在“三八”妇女节展览会中,开辟了妇婴卫生展览室^{[17]83}; (7) 举办卫生竞赛与参观活动。1942年5月,第五师政治部发出《关于夏令卫生工作运动的政治工作的指示》,要求开展卫生竞赛与参观活动^{[19]13}。

第三,开展卫生运动。新四军卫生部和各师卫生部经常有计划地开展春、夏季卫生运动,把经常与突击结合起来。如1945年5月1日至8月1日,新四军卫生部在军部机关及直属单位开展了夏季卫生运动。崔义田对运动十分重视,专门为运动召开过3次会议,布置各项工作。运动主要有3个方面的收获: (1) 各种疾病的发病减少,保证了练兵等任务的完成,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2) 基本消灭了虱子和疥疮; (3) 提高了干部和战士的卫生知识水平,增强了其卫生观念^{[17]100-102[14]163}。

第四,预防与治疗传染病、多发病。在新四军部队中多发的疾病主要有疟疾、痢疾、霍乱、伤寒、肺结核、肺炎、疥疮、砂眼、下肢溃疡、黑热病等。为了预防上述疾病,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通过各种途径,购买了大量疫苗,进行预防接种。如1941至1945年,各部队种痘和预防注射率达到90%左右,有效地预防了天花、霍乱和伤寒等疾病的流

行^{[2]124}。对已发生的疾病,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积极予以治疗。如1944年,第三师卫生部在阜宁县小杨庄设黑热病休养所,对黑热病患者实行免费治疗,1年中治愈千余人^{[18]60}。对传染病、多发病的预防与治疗工作,崔义田相当重视。如1943年秋,新四军军部驻地盱眙县黄花塘一带疟疾流行,“特别是恶性疟猖獗”,一般抗疟药物的治疗效果不佳,崔义田指示用“914”针剂注射,取得了良好效果。同时,崔义田在部队中,开展了防蚊灭蚊、抗疟、治疟教育,采取了土法灭蚊、驱蚊等措施,并派医疗卫生人员上门送药,使疟疾得以控制^{[14]163}。

第五,开展新兵体检与健康检查。新兵入伍时,为避免其将疾病带入部队,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严把体检关。对不符合入伍条件的,予以清退。对短期可以治愈的轻病员,先集中突击治疗,待病情好转后,编入部队。如1943年,第四师在对新兵进行入伍体检时,规定禁止有心脏病、梅毒、肺结核、黑热病的以及残疾人入伍^{[17]71}。1944年,据对第一师2个团新兵体检的统计,在1460人中,合格者为1203人,不合格者为257人,分别占82.4%和17.6%。其中,第五十二团退兵和遣散人员占29.3%^{[2]119}。

皖南事变前对部队的健康检查,是以新四军军医处为主导进行的。军部重建后,各师医疗卫生机构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组织对部队进行健康检查。关于检查的对象,各师也不相同。体检的项目主要有身高、体重、视力、血压、肺活量、内科、外科、五官科和化验等^{[2]120}。如1944年5月1日,第一师兼苏中军区卫生部发布指示,要求各级医疗卫生机关,从本年开,每年夏季对“党龄及军龄5年以上”的干部,进行1次健康检查,并把干部的健康等级分为4等,即“毫无疾病”“体质不是很强壮,但并不影响现任工作”“体质衰弱者,经常因疾病而影响工作”和“体质十分衰弱患有重病,不能工作或只能做很少一部分工作”^{[2]356-357}。对伤病人员,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先予以保障。如第五师的医疗卫生机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供应伤病员蛋类、肉类、白糖、藕粉、面条等^{[18]94}。

综上所述,崔义田作为新四军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主要领导者,在主持与筹划新四军医疗卫生事业的同时,还参加了许多医疗卫生方面的具体工作,为新四军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其中,在担任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部长,全面主持新四军医疗卫生工作期间,对新四军医疗卫生事业的贡献最为突出。在崔义田等人的努力下,新四军医疗卫生事业在艰难战争环

境中得到了快速且良性的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华中地区的抗日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中共葫芦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葫芦岛党史人物传(第二卷)[Z]. 内部资料,2003.
- [2] 石文光,伏斟. 新四军卫生工作史[M].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1.
- [3] 马洪才. 新四军人物志[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新四军·回忆史料(1)[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 [5] 房列曙. 安徽敌后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
- [6] 江西省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 江西新四军人物传(下)[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6.
- [7] 崔义田. 白衣战士忆陈总[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 [8] 《新四军战史》编辑室. 新四军战史[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0.
- [9] 马洪武,童志强. 新四军发展史[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
- [10]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苏中史编写组. 苏中抗日斗争[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
- [11] 扬州大专院校党史教学研究会,新四军黄桥战役历史陈列馆. 新四军黄桥战役史料[Z]. 内部参考资料,1981.
- [12]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淮北分会,江苏省泗洪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邓子恢淮北文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3] 新四军医学教育专辑编委会,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历史丛刊社. 新四军医学教育专辑(1938—1945)[Z]. 内部资料,1990.
- [14] 《崔义田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 崔义田纪念文集[C].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
- [15] 中共盱眙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 [16] 南京军区政治部编研室. 新四军组织发展实录[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 [17] 南京军区后勤部卫生部. 新四军卫生工作简史·历史资料与回忆资料部分(征求意见稿)[Z]. 内部资料,1989.
- [18] 江苏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卫生分会. 新四军卫生工作史话[Z]. 内部资料,2005.
- [19] 鄂豫边区卫生史编审委员会. 新四军第五师卫生工作简史[Z]. 内部资料,1990.
- [20] 新四军六师十八旅卫生工作回忆录编写组. 新四军六师十八旅卫生工作回忆录(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5月—1945年9月)[Z]. 南京:江苏省卫生系统政治思想工作研究会,1990.
- [21] 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淮南分会. 淮南史料(1)[Z]. 内部资料,1987.

On Cui Yitian's Contribution to Medical Treatment and Health Services of the New Fourth Army

ZHANG Jinlin

(School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46, China)

Abstract: Cui Yitian, one of the important creators and main leaders of the medical treatment and health services of the New Fourth Army, was in charge of the medical health system of the New Fourth Army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As an important leader, he organized and leaded his crew of medical treatment and health and often worked in the frontline, serving the wounded and treating the disease himself. He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medical of medical treatment and health service of the New Fourth Army.

Keywords: the New Fourth Army; Cui Yitian; the Anti-Japanese War; medical treatment and health service

(责任编辑:陆 勇)